

中国当代文艺学话语建构丛书
(第二辑)

吴子林 主编

冯 庆 著

诗与哲学 之间

思想史视域中的文学理论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第二辑】
第007号

朱自清文集

诗与哲学 之间

朱自清著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与哲学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文学理论 / 冯庆著.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3.9

(中国当代文艺学话语建构丛书 / 吴子林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7-5178-5537-8

I. ①诗… II. ①冯…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18522 号

诗与哲学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文学理论

SHI YU ZHIXUE ZHI JIAN——SIXIANGSHI SHIYU ZHONG DE WENXUE LILUN

冯庆著

出品人 郑英龙
策划编辑 任晓燕
责任编辑 张晶晶
责任校对 李远东
封面设计 朱嘉怡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宏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280 千
版印次 2023 年 9 月第 1 版 202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5537-8
定价 9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和营销与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71-88904970



冯庆, 1987年生, 重庆人, 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学、文艺理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研究等, 著有《古典与青年——理论时代的经典阅读》《中国人的义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 编译有《历史主义与民族精神——启蒙语境中的赫尔德》,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末民初审美启蒙论研究”和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项目若干, 曾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1批特别资助、《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一等奖(2017)等。

总序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遗产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发出振奋人心的号召:“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改革开放之初,当代中国文化曾有一种“文学主义”,文学在整体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深度参与到文化之中,激动人心,滋润人心,维系人心;文学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研究随之呈现出锐意进取、多元拓展的局面,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积累与探索成果。进入 21 世纪,资本逻辑、技术理性、权力规则使人遁无可遁,一切被纳入一种千篇一律的“统一形式”之中,格式化、程序化的现实几乎冻结了应有的精神探索和想象力,既定的文化结构令人备感无奈甚或无为。当从“文学的时代”进入“文化的时代”后,文学在文化中的权重不断下降。在当代知识竞争格局中,文学研究囿于学科话语而一度处于被动状态,丧失了最基本的理论态度和批判意识。

当代著名作家铁凝说得好:“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文学去点亮的。”^①奔走在劳碌流离的命途,一切纷至沓来,千回百折,纠缠一生;顿挫、婉转、拖延、弥漫,刻画出一条浓酽的、悲欣交集的人生曲线。屏息凝听时代的脉动,真正的作家有本领把现实溶解为话语和熠熠生辉的形象,传达出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一面,表现出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他们讲述人性中最生动的东西,打开曾经沉默的生活,显现这个世界内在的根本秩序——一种不可触犯事物的存在。

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文艺学一直居于领军的位置,具备“预言”的功能与使命,直面现实并指向未来,深刻影响并引领着中国文学研究不断突破既有的格局。“追问乃思之虔诚。”(海德格尔语)与作家一样,当代文艺学研究者抓住文学的核心价值(追求“更高的心理现实”,即“知人心”),并力图用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话语释放这一核心价值,用美的规律修正人们全部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知善恶”“明是非”“辨美丑”,帮助人们消除“鄙吝之心”,向往一种高远之境。

21 世纪以降,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传播乃至整个文学活动方式持续地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嬗变;与之相应地,审美经验、媒介生态、理论思维、

① 铁凝:《代序:文学是灯——东西文学经典与我的文学经历》,《隐匿的大师》,译林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6 页。

知识增量等交相迭变,人文学术思想形态发生裂变、重组,各学科既有的话语藩篱不断被拆除。“察势者明,趋势者智。”人们深刻体认到:中国作为一个拥有长期连续历史的巨大文化存在,其问题意识、思维方式、语言经验、话语模式需要重新发现与阐释,并且必须重新生成一种独立的、完整的、崭新的思想理论及其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文化环境、传统习惯及社会制度等密切相关,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现实根基。

进入新时代,文艺学研究者扎根中华大地,勇立时代潮头,与时代同行,发时代先声,积极回应当代知识生产的新要求,通过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致力于新文科观念与实践,重构当前各个知识领域的学科意识与现实眼光,有效参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孜孜于文艺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探索与创建,呈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贡献与话语表达,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新领域的开辟,新学科的建立,新话语的生成,需要不同见解、彼此争议的砥砺。章太炎先生当年就慨叹孙诒让的学术之所以未能彰显于世,是因为没有人反对:“自孙诒让以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①本着真理出于争辩及促进学科发展的愿望与责任,遵循问题共享、方法共享、思想共享的学术原则,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邀请本人编选、推出“中国当代文艺学话语建构丛书”。本丛书拟分人分批结集出版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收录各人具有典范性的、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佳作,以凸显“一家之言”的戛戛独造,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尽绵薄之力。

“中国当代文艺学话语建构丛书”第一辑推出了当代文艺学研究界中坚

^① 章太炎:《国学概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3页。

代学者陈定家、赵勇、张永清、刘方喜、吴子林、周兴陆的6部著作,备受学界同人关注。第二辑推出的是当代文艺学研究界青年才俊的6部著作:王怀义《中国神话诗学——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王嘉军《他异与间距——西方文论与中国视野》、李圣传《人物、史案与思潮——比较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美学》、王琦《当代西方书写思想之环视——以让-吕克·南希的研究为中心》、汪尧肿《居间美学——当代美学转型的另一种可能》和冯庆《诗与哲学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文学理论》。这些青年才俊生于20世纪80年代,师出名门,大都精通外语,受过良好的西学训练,又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而努力在中西思想的碰撞、交流、对话中,通过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致力于新文科观念与实践,自觉构建崭新的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理论话语体系。他们的学术思想比较前卫、先锋,6部著作都是穷数年之功潜心撰写而成的,它们融思想与学术于一体,具有健全的历史和时间意识,并由此返归当下,呈现了崭新的理论话语、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文化逻辑,汇入了21世纪的理论创造之巨流。

行文至此,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了柏格森及其生命哲学——

1884年暮春的一个黄昏,25岁的柏格森散步到克莱蒙费朗城郊。这是法兰西腹地的高原地带,漫山遍野生长着各种高大的树木。晚霞在万里长空向东边铺洒开来,远处卢瓦尔河的支流潺潺流动。柏格森站在高处,目睹河水奔流、树木摇曳、晚霞飘逝,突然对时光之逝产生了一种非常震惊的感觉。

在与尘世隔绝的静谧与冥思苦想中,意识之流携带着一切感觉、经验,连续不断地奔涌;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结晶体内部,也就是那些凝固的知觉表面的内部,也有一股连续不断的流:“只有当我通过了它们并且回顾其痕迹时,才能说它们构成了多样的状态。当我体验到它们时,它们的组织是如此坚实,它们具有的共同生命力是如此旺盛,以至我不能说它们之中某一种状态终于何处,另一种状态始于何处。其实,它们之中没有哪一种有开始或终

结,它们全都彼此伸延。”^①

时间无边无际、缄默不语、永不静止,它匆匆流逝、奔腾而去、迅疾宁静,宛若那包容一切的大海的潮汐,而我们和整个世界则如同飘忽其上的薄雾。时间之流的感觉驱动柏格森在克莱蒙费朗任教期间潜心思考时间问题,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从这部著作开始,柏格森发展了一套以“绵延”为核心概念的庞大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体系。1927年,为表彰其“丰富而生机勃勃的思想及其卓越的表现技巧”,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柏格森,并在“授奖辞”里写道:

柏格森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他独自勇敢地穿过唯理主义的泥沼,开辟出了一条通道;由此通道,他打开了意识内在的大门,解放了功效无比的创造的推动力。从这一大门可以走向“活时间”的海洋,进入某种新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类精神可以重新发现自己的自主性,并看到自己的再生。^②

吴子林

2023年6月9日于北京

①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刘放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页。

② 柏格森:《生命与记忆——柏格森书信选》,陈圣生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自序：哲学与诗之间的理论生活

一

在西方，“理论”一词的希腊语是 θεωρία，本义为“静观”“审视”，渐渐引申为“思索”和“理论”。这个词与“爱智”（φιλοσοφία）——现在所说的“哲学”——这一生活方式紧密相连。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最后一卷当中就将这种唯有哲人能够从事的生活方式称为沉思的生活或者说理论生活。^① 理论意味着对现实事物背后的原理进行审视与追问，意味着朝向个别背后的普遍展开科学探究。与此相对的生活方式，就是实践，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

在今天，“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成了许多人以日常生活的名义回避理论的理由。这里的“生活”当然并不是指理论生活，而是指日常生活，是劳动、需求和创作。人们对理论生活的回避，实则印证了两类人具有天然

① 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征引参考了 Robert C. Bartlett 和 Susan D. Collins 的英译本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和廖申白的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本书所有引述《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内容均同此，只随文标注贝克尔编码。

的差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紧贴大地——从满足肉体基本需要,到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在七情六欲当中过日子,从事他自己本分的实践。与此相反,极少数“理论人”热爱思考和探究,他们对纯粹知识或智慧的渴望远大于对尘世生活享乐的需求,他们自然认为理论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值得追求。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讲,这极少数人的“理论生活”根本不算生活。

从事理论生活的人总是异类,或是由于没有兴趣,或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必要性,又或是担忧自己的生活干扰到多数人的生活,他们自己总是和大多数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这极少数异类也是人。热爱智慧的心灵必须依附在具有热量的肉体之上。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生活无法脱离实践生活。人天然是社会性动物,极少数人与多数人必然要共处。在很多情况下,极少数人不得不和不理解他们、不信任他们的人一起生活,并且按照世俗的原则和逻辑展开实践。然而,这种世俗的实践原则在擅于理论的人看来,总是有缺陷的——就像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在极高明的智者眼中都有其缺陷一样。这也就决定了理论家必须首先把在理论上不完美的具体现实世界视为他的理论生活的基本前提。面对这种不完美的世俗状态,极少数人当中不愿意屈服于世俗的,可能会前往高山与孤岛当苦行者和隐士;另一些则留在了社会共同体内,或是隐藏起来,安稳做人,或是大发宏论,试图改变现状。

与理论的热衷者们不同,大多数人在追求纯粹知识与智慧方面没有生存性的欲求——他们天然不爱追求至高的普遍性真理,而只能依赖信仰来虚设一个普遍作为他一生思考与行动的基础。这样的大多数人、这样的民众仅仅凭借文化与经验交付的知识,就足以找到此生的幸福。然而,与少数追求至高知识的人相处时,他们或是感到可怕,或是觉得自卑。如果恐惧的情绪超过了容忍限度,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驱逐少数人,甚至毁灭他们。如果自卑的情绪到了极致,大多数人会纷纷向少数人下拜,尝试学习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所以,智慧之人或是由于危险而遭到迫害,或是由于卓越而受到崇拜。这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历史上的伟大文明奠基者,如孔子、苏格拉底

等,大都遭遇过多数人的迫害与排斥,但同时又受到另外一些人的崇拜。

迫害有时来自个人,更多时候来自人类共同体的代表,也就是统治者。一般认为,迫害知识人或智慧之人的君主或政府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与利益。但进一步说,若是站在任何一个统治者的角度,他既然要为共同体负责,就得考虑共同体内部风气的稳定,因为唯有风气稳定,国家的实体才会有条不紊地运行。一个共同体无论看上去多么开放,都有不可撼动的礼法与风气的基石,在这块基石之上,上至统治者、下至被统治者的行动都将得到根本的规范。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种规范就是意识形态。

但这个礼法或者说意识形态究竟是否能够经受住不断追根问底之人的考验,则是成问题的。在大多数时候,一个共同体的礼法来源于绝大部分人共同生活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意见与原则。但这种东西毕竟是一种意见,未必是真理。现实主义的立法者相信,这样一种普遍受到同意与敬重的意见已经足以成为礼法的基础。如果强行要对这些普遍受到同意与敬重的意见进行批判、怀疑与革新,那么,哪怕最终揭示了不折不扣的真理,但由于民众无法接受这种突然来临的变动,他们的心态和风气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纷乱。民众的纷乱如果达到一个临界点,共同体的基本礼法就会遭到破坏,动乱、分裂和灭亡也就可能随之而来。

所以,在一个共同体当前的统治者眼中,过度的知识探索必然会危害到自己共同体的秩序,不仅仅会危害到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还会危害到共同体其他阶级成员的利益。立法者不可能在由少数理论探索者所揭示的绝对真理之上建立礼法,原因在于,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从事理论研究的能力和兴趣,难以企及也不关心什么是绝对真理,他们业已受到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影响,宁可在普遍受人信赖的意见当中生活。举例来说,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就是这样一种意见,如果有人传统中国追问“为什么人要生育后代,为何要繁衍”,就可能威胁到社会风气,被视为异端邪说。佛教当初在中国遭到强烈抵制,原因或许就在于禁欲生活会导致繁衍和生产的断绝。少数追求智慧的僧侣的禁欲生活只符合他们自身的生存倾向,却违背大多数

人的天性和既有的认识,不适合构成社会风气甚至国家主张。明智的立法者通常会选择或创建最贴近大众自然本性的思想和宗教来承担礼法任务,绝不会将最高明、最少人懂的知识当作所有人应当企及的目标。

从热爱智慧者(简称“爱智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天性使得他们会一切并非真实的东西产生怀疑。大众的生活中则往往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景与妄想。爱智者把这些幻梦或者意见刺破,多数时候会引起大众的不满和恐惧,有时甚至会引出大众的疯癫与肆意妄为。所以,足够智慧的爱智者要么会保留意见,要么会采取特殊的表达策略。比如,有一类爱智者会把自己伪装成赞同大众意见的那类人,用巧妙的修辞和言说方式向少数能够理解自己的人传达思想。正如文学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古代的言辞艺术充满了隐喻、暗示和双关,并非为了显示轻薄的机巧,而是基于作者们严肃且精微的政治洞见。这就是古之学者独到的节制与明智。

理论生活在本性上需要有意为之的节制,这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因为在实践生活中这么做,最终也是为了满足极少数爱智者人之为人的社会性:爱智者的共同生活或者说传宗接代也与多数人有着天然的区别,其所依赖的是知识与智慧的分享与传授。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里的“朋”当然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更应该将其理解为在学识与生活向度上有着共同品位的精神密友。热爱智慧、从事理论之人和大多数人一样也需要朋友,只是他所需要的朋友是与他自己类似的人。这样的人所构成的小共同体与大多数人所构成的国家、社会、市场、军队等都不一样。在现代社会,最接近这种小共同体的,只有部分的知识共同体。也就是说,爱智者的体验与尺度,永远只可能形成小范围的共同诉求。

热爱智慧,未必要让所有人都加入热爱智慧的行列。在某种程度上,爱智的生活只有极少数人有能力享受。对于他们来说,获得纯粹知识与智慧,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这的确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感受到的快乐。反过来,对多数人来说,学习知识仅仅是为了在社会上谋求一个确定的位置,然后尽可能满足自己的身体或感官需求。大多

多数人的幸福是与自己的家庭和团体共同过上吃好穿好玩好的日子。学习知识,或者说哲学与科学探索,在他们那里仅仅是提高生活品质的一种附属工作,一项不得不为的义务。

但无论如何,热爱智慧与纯粹知识,当然也是一种生活取向,对少数人来说,它甚至是唯一的、至高的生活取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灰色的理论,对爱智者来说是丰富多彩的生活。大多数人的共同体生活当然也是丰富多彩的,但热爱智慧的人既能够回到这种多数人的共同体生活当中,又不为其中的诸意见所迷惑困扰,反而让自己乐在其中。真正的理论高人,既可入世,又可出世。唯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泰勒斯既会仰观星空结果掉进水井,又能通过观测气候大赚一笔;才能理解《庄子》中的贤者王倪为何“大隐隐于朝”。而王倪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师被衣带有讽刺意味的歌谣,也许正是在描摹一般人眼中这极少数高明之士的生活姿态:

形若槁骸,心若死灰。

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

二

理解了理论生活的特性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文学理论这个现代研究领域内的内在张力。理论或者说哲学,意味着与世俗生活有别;文学或者说诗,则要求来源于生活、返回生活。这样一来,关于文学的理论,就与纯粹关于自然界、关于至高真理的那类理论探究有了差别。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文学理论要求从事理论者回到世俗生活的文学经验当中去体验、发现、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智慧。“文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必然是以现实的社

会政治生活为基础的哲学思索,进而也就和“政治哲学”发生了关联。

熟悉历史的人会知道,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并不存在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而只有音乐、诗与修辞等概念。音乐、诗与修辞是城邦生活中自然存在的;相较之下,关于艺术、诗与修辞的理论则是次生的、反思性的,和反思一切城邦生活的政治哲学是同时出现的。从现代的学理来看,自从政治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诗学》)对赫西俄德、荷马、索福克勒斯等诗人展开论述以来,自从诗和哲学的交锋开始以来,文学理论的历史也就随之产生了,以至于现代许多文学理论教材都喜欢从柏拉图讲起。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最早的文学理论家就是哲学家,准确地说,是政治哲学家。这与中国的情况很相似,孔子、刘勰、钟嵘乃至王国维,都时刻关心政教、道德与人心等根本问题,他们绝非如今理解的文学理论家。

回到现代语境中,不难发现,在现代学术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显得格外另类。一般说来,研究文学理论,就得首先具备哲学沉思的素质,又得拥有文学的识见和感悟力,还得具备相当程度的思想文化史功底,最好还能有一点关注共同体生活的伦理与政治常识……这简直是要研究者都成为柏拉图、歌德、海德格尔这样具有旷世天分的诗人哲学家。由于做不到,人们在接近文学理论时往往会自我限定,提出一种研究“理论”的具体路径,以免大而无当、顾此失彼。

在我看来,研究文学理论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通过大量的感悟和归纳来探索潜藏在艺术作品背后的理论;二是从哲学原理当中阐发、演绎出用于解决现实文艺问题的理论;三是梳理各家各派理论的历史延续和突变,从其自我显现的现场中找出规律,这就要求能够从当代流行理论的内容和背景出发,“由小推大,由今推古,所谓‘见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①。

探索一种思想史视野下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是本书的目标之一。我选择第三种路径,不仅出于个人心性与兴趣,还出于对当下文论研究范式的

① 廖平:《穀梁古义疏》,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页。

不满。在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那里，西方理论似乎是平面的——翻开图书馆中常见的种种文论教材和文选，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的各种观念和意图被平行地列举在各章各节之中，显得它们好像天然地位平等、层次相同。同时，这些理论又被文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的问题时随意引用，但很多时候显得有些笨拙，甚至引喻失义……在我看来，这两种做法都不合常识。一个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在于它有其主导性的精神内核。无视这些主导精神融通、分裂和循环的历程，不去体察理论家的言说和争鸣语境，把握其真实意图，就不可能摸清复杂的思想史，也就自然不可能写出深刻的文论史。其实，并不是过去的学者不明白这样的道理，而是大多数学习西方理论的学者都带着西学为用的功利目标，他们只是想找到合适的理论话语来服务自己的批评实践。受到历史视野的局限和研究方法的束缚，这些学者以为西方理论就是一个超级市场，一切逻辑和方法都像商品般陈列其中，可以随意挑选着使用。这种做法一方面源于进化论影响下的盲目自信，认为相比过去的人，我们必然视野最宽广、思路最清晰，现代化的科学识见比古老的更进步、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则因为功利心作祟，想借用文学研究的标题实践别的事业，难以静下心来慢慢摸索……很少有人想过，如果不认识清楚“体”，从哪里去谈“用”。就像我们不能在没有搞清楚药物的副作用时就吃药一样，我们也不能在没有搞清楚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时，就急着谈论批评实践的话题。

这就是我选择西方文学理论之现场状态作为写作线索的问题意识：只有通过把握观念发生的具体场域，梳理清楚其作为言辞而得到表述的整个背景、起源和后果，我们才能说真正搞懂了一种西方理论，进而明白它的目标、价值与品位，有节制地使用它。不懂得一种理论在思想史上的真实情况，不去追源溯流，“做”出来的“理论”也是肤浅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当某人以某种方式获得信念，并且也了解这种信念的起源，那么他就有科学知识；因为如果他了解的起源不比结论更多，那么他的知识就不过是偶然的。”（1039b32—35）

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界最感兴趣的西方理论可以说基本上是美国理论。这里的美国理论指的不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理论,而是指在美国的学术市场上等待出售的诸国理论。一本名叫《法国理论》的书介绍了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著名法国理论家在美国的遭遇:“他们的名字……都美国化了,其法语发音渐渐被人淡忘;这些名字横跨大西洋,成为必引书目,但在他们的祖国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①正如阿伦特、马尔库塞等德国思想家在美国走红的境遇一样,法国理论首先在美国变成时尚,然后“返销”欧洲大陆并最后“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口中的西方理论大多通过美国大学的学术中介而为世界所知。从一些细节出发,考察美国文论乃至美国思想界的真实状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当代西方思想的脉络。而我的研究也绝不仅仅局限在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范围内,而将回归到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思想的关键节点,试图把握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起源。据说“做”理论让我们生发出“相悖的需要,即用认知的语言去理解某种在本质上无法认知的事物”^②,那么我们又出于何种意图、基于何种视角,去从事理论的历史性研究?

出于关注思想之发生境域的诉求,在研究西方文艺理论的过程中,我将首要关注当代诸多观念背后不同的观念立场之间的论争,这些论争或是即时发生的,或是横跨千年的思想冲突。这些冲突包括古与今、右与左、传统与进步、专制与民主、理性与启示、科学与文艺、共同体与个人的冲突。我要采取由今天向往昔追述的方式,回归到古希腊、中世纪、启蒙时代与现代的一些关键节点,试图用个案研究的方式,把握当代西方理论的现场状况。这并不是以往常见的人头研究,而是以这一系列理论家的观点为火引,点燃询问的灯,仔细审视(θεωρῶ)这些言辞戏剧背后隐藏的那些真意。

① Franç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How Foucault, Derrida, Deleuze, & Co. 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ns. Jeff For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2.

② 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1 页。